

论铁凝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李正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 作为新时期的一位代表性女作家, 走向历史是铁凝在转型时期选择的策略。她在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和《笨花》中, 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角度阐释女性的历史命运。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情态解构历史, 同时还原和建构女性历史。她采用女性的言说姿态, 体现出女性历史叙事的主体性, 描绘了女性视角下独特的历史风景, 率先完成了女性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双重主体价值的建构, 为思考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角度。

关键词: 女性视角; 历史叙事; 铁凝; 长篇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2) 03 - 0023 - 06

历史叙事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所谓叙事 (narrative), 是指一种将特定的事件按时间序列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并赋予其意义的话语模式。通俗意义上的叙事, 往往被等同为“讲故事”。^[1] 因此, 历史叙事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远离现实而又能被人理解和把握的话语空间。法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曾经说过: “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 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历史一样。”^[2] 对于女性作家来说, 历史文本常常是由某种现实环境所触发、在历史记忆中被发掘后的重新阐释, 是她们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面对同样一个历史文本, 女性在选择史料、关注角度、书写方式上往往表现出和男性作家较大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历史”, 并非人类发展进程之外的另外一种历史, 而是以女性为主体进行的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是对以往被男性话语所掩盖、压抑的人类另一种生存真相的思考与书写。走向历史也是铁凝在转型时期选择的策略。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 铁凝和她的同龄人一起, 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事件, 在新时期文学中, 取得过非凡的文学成就, 在某种程度上是宏大叙事写作方式的代表。进入转型期以后, 她顺势就势,

把人物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希望通过“历史”通道还原人的本相, 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角度阐释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在长篇小说中, 站在女性历史叙事的角度, 铁凝有意识地瓦解“宏大叙事”那种基于某种先有的政治理念对历史进行整体的评价后对历史的描述, 她在区别于男性视角的女性体验中, 以女性的视角重构人性史的书写。较之同时期的男性作品, 体现出女性历史叙事的主体性逐渐确立的取向。

一、日常生活情态中的历史画卷: 被解构的历史

张爱玲说: “女人是最普遍的, 基本的, 代表着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3] 女人总是与日子密不可分, 大多数女性的生活淹没在日子之中。当社会灾难袭来时, 现有秩序被轻易地改变甚至颠倒, 男性会受到重创, 女性却凭着其生命的韧性, 成为男人和家园的守护者。与 20 世纪 80 年代男性作家们着重反映历史大事件的写法不同, 铁凝似乎更关注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以边缘性、民间性视角勾勒出为人所忽略的女性隐性历史。她的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立足于女性特有的对日常生活的敏感, 用自然的笔触, 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日常化生活情态中人类生存

收稿日期: 2011 - 12 - 27

作者简介: 李正红 (1974-), 女, 浙江杭州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旅游文化。E-mail: 505539265@qq.com

的历史画卷。

小说《笨花》的叙事采用了以庸常琐碎的生活表现宏大题材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从晚清末年到抗战胜利 50 多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通过对日常化生活情境的具体描绘,铁凝完成了对被历史扭曲、忽略的女性表达。在她看来,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仅由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构成,也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小说中几次描写了黄昏下笨花村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变迁。开篇不久,作者就展现了古老乡村静谧美好的黄昏:回村在家门口打滚儿的牲口,推小平车的鸡蛋换葱的买卖人,挎着大柳条篮子卖烧饼的老人,卖煤油的和他们的吆喝,邻县口音的狡黠的卖酥鱼人,从东向西去元庆媳妇家的“走动儿”,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一幅自在、和谐的中国乡村的生活图景。笨花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这里遵循的是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存方式,日子就像流水一样从文本中静静流出,笨花的黄昏、收获季节的棉花地、过年的庙会,叙述着岁月的流逝,一切行进在历史之中又似乎在历史之外,对大历史吸纳、消解着。同样是黄昏,日寇入侵后的笨花黄昏则显得萧索、寂寥:

事变后,笨花人不再注意这么好的月亮,这么好的黄昏了。黄昏里,向家巷少了那个卖煤油的,笨花人不再用煤油点灯,向桂代卖的植物油灯果然代替了煤油灯。……后来,卖煤油的不来了。黄昏里那个卖酥糖烧饼的老头也不来了,笨花不再有人买烧饼吃,先前买烧饼吃的人不愿再“露富”,生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那个卖酥鱼的是外县人,外县人更不敢再越过县界到邻县去冒险。有消息说,日本人就专抓这种游商,抓住了就说他们是八路奸细。向家巷的黄昏里只剩下了一个鸡蛋换葱的,他把葱车放在向家巷,半天也喊不出一个换葱的——笨花的鸡蛋也少了。有消息说日本人进村先杀鸡,笨花人就觉着,把鸡让给日本人,就不如自己先吃了。向家也杀了几只鸡,……向家吃鸡,影响了半个村子。人们都说,连向文成都杀了鸡,日本人真要进村了吧。……笨花的黄昏是变了样了。^[4]

历史的风云变幻、异族的侵略战争等大事

件,被定格在笨花村曾经一成不变的黄昏中。在这种司空见惯、琐碎却又真实的生活图景中,历史的崇高感和距离感不知不觉地被消解。但这恰恰是女性视角下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它贯穿在日复一日,细细碎碎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当中。

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也被以更接近现实的方式重新描摹。其中频繁现身着的如孙传芳、王占元、吴光新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然而在铁凝的笔下,他们显现出一个历史人物在生活中真实、平凡的一面。曾任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在许多文本中是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形象,但在《笨花》中,他的出场则是在平凡而庸常的生活场景中。作为主人公向喜在军事学堂的老同学,和向喜合租在农家小院,一起在院里槐树下喝茶,一起去白远章包子铺吃包子。随后,他在小说中时隐时现,在向喜的几次重要的命运转折点上和主人公或多或少地发生着联系与交集。这样的写法,轻而易举地使得笔下的主人公向喜与向氏家族所在的笨花村和中国那一段特定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把我们从小说中带到了历史的纵深处。

小说虽然描写了诸如军阀混战、民国成立、抗日战争等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采用了这种还原历史,呈现生活原生态的日常叙事,通过这种对日常凡俗生活的细致描写,铁凝将历史中的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女性的命运放在战争历史的特殊背景下,来表现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境遇。在时间线性推进的线索之外,利用向喜和笨花村这两个空间的交替转换组织情节,将历史的风风雨雨与日常的家长里短并置于人类的视野,这种情节结构其实正暗含着作家的历史观:漠视个人的大历史是不完全的,历史是由政治风云与家长里短共同构成的,对后者的漠视会造成历史的断裂与缝隙,而这正是作家表达个人生命体验的空间。

《大浴女》是铁凝书写“文革”历史的一篇力作,小说中,“文革”只是一个表现人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小片段,但铁凝也更为深刻、细腻地表现了她对日常生活场景中人性的挖掘,而且文革成为了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一种契机。在表现“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们遭受到长期的思想压力和性压抑时,作者选取了这样一个日常生活

的角度：“文革”期间，章妩、尹亦寻夫妇被下放到地方农场劳动改造，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管理。他们被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夫妻分居。这样的“管理”无疑是违背人性的。作为“仁慈”的例外，山上一间小屋会对集体宿舍的夫妻开放。80多对夫妻必须在星期日的一早用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排队”方式进屋，在众目睽睽中紧张而又潦草地完成夫妻之事，而且和镇上的烧鸡不能兼得。性本是人类最隐秘之事，然而，在特殊的年代，夫妻间原本正常的生理欲望却必须被强行公之于众，这无疑是对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赤裸裸的践踏。通过这样一个生活中最普遍又最隐晦的欲望的被压抑，那个特殊年代在作者的笔下呼之欲出。女性对历史的感知和触摸以个体生命为出发点，经由爱情、婚姻、家庭完成了。

铁凝的长篇小说中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于男性话语主体作品中的历史叙事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宏大叙事无疑是一种突破。但是，她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和“新写实主义”的日常化写作还是有区别的。尽管二者都有对传统文学中历史叙事典型化和崇高性的突破与消解，但正如学者贺绍俊所言，铁凝对其关注是“缘于她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她是以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去看待日常生活的，越是小事琐事，她越是能发现其中感动人的细小颗粒”。^[5]可以说，铁凝对生活的敏感，是因为她作为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作为女性，她的文学是和生活真实世界相通的。

二、历史夹缝中的女性生存：家族、血缘与宿命

几千年来，历史都是男性按照父系的谱系来书写的，以父系血缘血脉来传承。女性作为母亲、妻子、女儿，一直隐没于其中。她们在历史中的遭遇和命运，都在男性主体的叙事之中，女性的历史也依附于男性的历史长久被忽略。新时期以来，一些女作家试图重新书写女性的谱系，构筑以母系家族为中心的历史，如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徐小斌的《羽蛇》等都尝试了从女性视角进行历史叙事。和这些同性作家一样，铁凝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鲜明的女主人公形象，通过女性家族史的建构，致力于还原和建构女性的历史。与传统的以父系家族为中心的历史

不同的是，这种母系家族史叙写往往是琐屑而单纯的个人史，它忠实地记录女性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历程，对历史人生的思考也是个人化的。在铁凝看来，每个女人都有她们存在的理由。她们在时间中的生存，是一种看上去微不足道，然而却是最具韧性的隐性历史，这种历史往往联系着一个女性被遮没的人生经验和个人遭遇，带着女性曾经或将继续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经验，传达出女性丰富而细致的时间感和历史感。而这个视角有别于男性的历史叙事和价值取向之处在于，将女性的感悟与体验带入历史叙事中，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拆解宏大叙事和男性叙事，显示了独到的女性视角，也使历史更具有女性主体意识。

在长篇小说《玫瑰门》中，她以女主人公司猗纹的一生为主线，通过这个家族三代女性不同的遭遇和命运。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女性如何在主流历史的边缘寻找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铁凝自己也说：“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称为‘玫瑰战争’了。”^{[7]69}小说的叙述人苏眉和外婆司猗纹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吸引，而小说中的姑爸则以自己的特立独行深刻地诠释了女性的悲惨命运。新婚之夜的新郎抛弃，使原来的“大辫子姑娘”变成了分头、抽烟斗、穿男装的不男不女形象，她试图通过消灭自己的性别的办法来改变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但“文革”中残酷的性别暴力还是还原了她的性别。无论是姑爸的尝试逃离或司猗纹的试图改变，都无法逃离特定历史语境中男性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的暴力，摆脱男权文化下女人的宿命。她们都在反抗性别压迫的同时又无法逃离性别带给她们的侵扰和苦难。

如果说对《玫瑰门》中女性命运进行叙述时关注的是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力感，《大浴女》则是将女性的成长置于同一时代进行书写，在展现女性内心的欲望与幽暗的同时，也不时闪现出人性的温暖，通过女性灵魂的成长建构起女性固守生命、超越自我的心灵成长谱系。小说讲述了母亲章妩和女儿尹小跳、尹小帆等两代女性的情爱救赎、精神忏悔和心灵成长的故事，展现出女性

经历生命与灵魂的沐浴一步步走向更纯净的精神境界的过程。

铁凝常常采用男性缺席的方式来凸显女性的在场或者说建构女性自我秩序,这样使女性有了足够的空间来面对外部及内在世界。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单薄孱弱的,他们的出场也是短暂的。《玫瑰门》中,少女时代的司猗纹爱上革命者华致远,在十八岁那个秋天的雨夜将自己交给了他,本该是两性和谐的时刻,铁凝对男性华致远和女性司猗纹的心理描写却耐人寻味:“……他和她有所不同,她觉得她已是经过改变的自己,他却觉得他是自己的没有改变。”^{[71]25}以至于司猗纹再回忆起这个雨夜,“总觉得像一场美好而又不真实的梦。这个美好的梦伴随了司猗纹一生,但终究只是虚幻”。^{[71]264}一个在男性文本中可能会光彩照人的革命者形象在女主人公顽强的生命力映照下却黯然失色,从她坎坷而又真实的人生中淡出了。而她的丈夫庄绍俭在结婚之前早就另有所爱,新婚之夜一夜未归之后就扔下她去了扬州,连书信往来都没有,只在儿子病死和染上性病、“犯了事”后回来过几次,每次回来都不过是“释放灾难”和“倾倒肮脏”,却从不在经济上周济庄家,连女儿庄晨都觉得“如果说庄绍俭对于她就像个影子,那么司猗纹便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实在”。^{[71]244}也正是因为庄绍俭对家庭和儿女的不负责任,才使得司猗纹的才能在庄家崭露头角,她一个人买下了庄家的宅子,拉扯大了儿女,奉养着庄家的老老小小,精打细算,努力经营着庄家。而作为庄家唯一男人的儿子庄坦,“从精神到肉体他好像都缺乏必要的根底,哪怕是人最起码的那点根底。”^{[71]243}不仅如此,他还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打嗝儿,甚至在他和妻子竹西过夫妻生活的时候也控制不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打嗝儿这个毛病在一天夜里被达先生的惨叫吓得消失了以后,在夫妻生活中,他竟也“不能”了。最后,庄坦在看到妻子竹西残酷、冷静地解剖母鼠的画面后,竟然被一锅沸腾的酷似老鼠胎儿的五香花生米活活吓死。和他相比,妻子竹西的冷静、大度、敢爱敢恨,母亲司猗纹的顽强、积极、无所顾忌,显得和这个小说中的失语的男性世界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同样,《大浴女》中的三个重要男性人物也都处于失语状态:电影导演方兢、建筑师陈在、美国人麦克都是围绕小说女主人公尹小跳的成长存在的。这三位杰出的男性都是她的爱慕者,但和有头脑而且独立的女主人公相比,他们显得或委琐或单薄。方兢身上暴露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一些普遍性的毛病。陈在在作品里的作用几乎就是表现尹小跳的价值,对于尹,他苦苦相守了几十年,甚至为了能和她结婚而毫不犹豫地与新婚妻子分手,但这一切最终都被尹的一个拒绝给彻底瓦解。和女主人公不断在成熟中蜕变的美好形象相比,几个男性的形象明显缺乏个体生命的光彩,处于集体失语状态。

但男性的缺席并不代表男权秩序的不存在,相反,男性秩序时刻以强大的力量规约着女性。《玫瑰门》中司猗纹是因为在男性世界遭遇到情感的缺失、欲望的压抑和精神的摧残,导致了心理的扭曲和变态。于是以乱伦来报复猥琐的公公,跟踪窥视儿媳和外孙女,她从男性秩序的受害者变成了男性秩序的实施者,这一形象可说是历史风云中一个不无悲剧的女性形象剪影。几千年来,父权文化以各种名义利用、扭曲、奴役着女性的生命。在这一文化下,和平时期试图进入历史的司猗纹、姑爸也好,战争年代的取灯、小袄子也罢,无论是试图进入历史的司猗纹和取灯,还是企图逃离历史的姑爸和小袄子,最终都没有能逃离历史中男性秩序的暴力,改变作为女人的宿命。铁凝笔下这些历史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三、女性的自我言说:颠覆男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作为女性作家,铁凝更容易走进同性们微妙丰富的内心世界,刻画同性们复杂细腻的心理情感,从而真正地完对完全意义上的完整的人性的表现,呈现出历史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她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混合特质,甚至是违背男性社会价值观的,但作者对女性形象并不加以道德评价,有时甚至寄予了同情,以此来颠覆男性社会的传统价值观。

《玫瑰门》中的司猗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一些学者所说,“铁凝在表现司猗纹因

受压抑、摧残而痛苦、绝望、挣扎、疯狂，由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害人者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否定她人性中美好的一面”。^[6] 司猗纹在遭受到丈夫抛弃和公公冷眼后对庄家的苦心经营，在情人朱吉开死后对她母亲的探望都展现了她的有情有义，年轻时来自家庭的反对导致了她的初恋的失败和后来婚姻的不幸。十几年后当她决定改嫁时又受到丈夫的强烈阻挠。当丈夫和情人相继离世，彻底将她禁锢在庄家家庭主妇的位置上不再有逃脱的可能。这样一个扭曲的，在传统男性文本中可能成为口诛笔伐对象的人物，铁凝在描写时却饱含同情。小说中描写司猗纹被突然归来又突然离去的丈夫染上“脏病”后，没有去诅咒丈夫的不洁，而是怨恨着自己。当她康复后，“才把自己投进丁妈的怀抱里哭起来。长久以来她一直寻找着一块可以哭的地方却寻找不到，她常觉得世界很大可供人流泪的地方却很少……司猗纹四十岁，她以一场恸哭结束了她的前四十年”。^{[7]186}

铁凝以自己细腻的洞察力写出了女性在夫权文化下遭受戕害后令人心酸的境遇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关注女性命运的背后也揭示出了造成这种不幸的社会原因，造成司猗纹最终性格扭曲异化的并非是她个人的欲望本身，而是父权文化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欲望的压抑和摧残。司猗纹的前四十年，正是遵循父权文化被其所压迫的四十年，因此当病愈后的她选择用自己的肉体对道貌岸然的公公进行性征服和还击时，是姿态从容的，这场有违伦常的性侵犯颠覆了男性文本中此类事件的性别角色，女性成了暴力的主动者，“许久，当她认定她的目的已经达到她再无什么遗憾时，才下了床向他投过一个藐视的眼光。她像逃脱厄运一样地逃脱了这个房间，也许那不是逃脱，是凯旋”。^{[7]188} 而和她的凯旋相对应的却是之后庄老太爷的夜间惊醒和盗汗。传统性别文化下伤风败俗的事件本身的道德意义被作者淡化了，成了主人公宣告对自己身体和意志完全拥有自主权的宣言，对传统道德原则的蔑视。

在一些“反面人物”身上，铁凝更是表现出叙事主体复杂的混合特质。《笨花》里的小袄子是个颇具光彩的角色。这个聪明却又无知的浪荡女子，表现出了乡村社会一种真实的悲剧性存

在。她与声名狼藉的母亲大花瓣相依为命，是在村人的白眼和蔑视中长大的，走上她母亲的道路仿佛是个必然。但即便是大花瓣和小袄子这母女俩，作者也没有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小袄子的不幸来自于她的家庭和她的生长环境。小袄子参加革命，是因为女八路都穿在村人眼中时尚的“紫花袄”，后来被日本人利用出卖同志，是因为秋贵曾为她买过一块日本毛布。对革命的向往或背离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阶级立场使然，而是源自女性对服饰的敏感和虚荣的追求，从而使得历史具备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女性的历史不再仅是大历史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对于小袄子而言，作为处于战争夹缝中的女性，不仅面临生存危机，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男性的压抑。小袄子和取灯虽非属同一个政治营垒，但俩人最终同样地遭遇了毁灭，她俩的毁灭呈现了男权文化下战争中女性命运的悲剧。

铁凝借助于对战争夹缝中的女性生存的言说，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揭示出以往被宏大叙事遮蔽了的女性个人生存体验，使这一文本成为女性生存真实状态的述说，完成了对于女性历史命运的追问。同样《大浴女》中堕落的唐菲，为了好友的工作，主动找市长出卖自己的色相，看到好友为爱苦恼，亲自找到伤害好友的人去理论。这些真诚坦荡、有情有义的人物让我们在为其命运唏嘘的同时感受到了人生的厚重与美好。铁凝以一种全新的关照方式，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在她笔下，女性走出社会的道德界定，表现了不以男性意志为中心的女性的主观意志，也袒露了道德无法判定善恶的女性的情欲与血肉之躯。对女性真实历史境遇及生存状态的展示，无疑是对男性社会传统价值观的解构与颠覆。

四、结束语

从中国文坛最具实力的女作家之一的铁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历史叙事成功地借助文学的舞台，通过自己的言说方式参与回视历史、解说历史，以女性主体的性别经验和对历史的阐释，使以往被忽略的女性话语浮出历史地表。通过真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让历史回到了人的本身。女性历史叙事在性别书写与历史想象互相交融的过程中，提供了女性群体表达自身话

语的空间,同时也为思考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角度。

参考文献

- [1] 彭刚. 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J]. 历史研究. 2006(3): 23-28.
- [2] 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98.
- [3] 张爱玲. 谈女人[J]. 天地. 1944(3).
- [4] 铁凝. 笨花[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346.
- [5] 贺绍俊. 铁凝评传[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63.
- [6] 铁凝. 铁凝文集: 自序五章[N]. 文论报, 1995-03-01.
- [7] 铁凝. 玫瑰门[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 [8]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39.

On the History Narrative of Tie Ning's Novels

LI Zheng-h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modern female writer, Tie Ning chose history as her topics in that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her novels: “*The Rose Door*”, “*Big Bath Woman*” and “*Cotton Flower*”, she attempts to explain women's historical destin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She also tries to interpret, construct and restore female history by depictions of daily lives. Her works reflect the history subjected by female and depict a unique femal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andscape. She is the first writer who completed the bi-subject value construction of women as “human” and “woman” and thus she provides a unique point of view for seeing the history.

Keywords: female perspective; historical narrative; Tie Ning; novel

(责任编辑 张文鸯)